

世界现代前期 宗教史

张伟达 王美秀 著
杨廷久 李 革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讲述世界现代前期三大宗教发展简史。这一时期,作为欧洲广为流行的基督教,从总体上看在西方发展比较顺利,逐渐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经济竞争、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的形势,并随着殖民主义的武力扩张,使基督教传入了亚非拉广大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宗教。而佛教则无论是南传佛教,还是北传佛教,都处于衰落和沉寂状态。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亚非一些主要国家里非常活跃,成为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在这些地区,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伊斯兰教组织纷纷建立,担当起了当地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目 录

世界现代前期宗教史

一、概 述	1
二、罗马天主教	7
1. 罗马天主教的“国际文化斗争”	7
2. 罗马天主教的社会政治观和“公教行动”	17
3. 罗马天主教的神学自由主义	21
4. 欧洲大陆以外的罗马天主教	26
三、基督教新教	35
1. 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新教	35
2. 欧洲大陆的路德宗和改革宗教会	41
3. 英国和美国的基督教新教	46
4. 基督教新教在亚非拉	59
四、东正教	68
五、北传大乘佛教文化圈的衰而重振	73
1. 中国居士佛教	73
2. 日本佛教的世俗化	83
3. 朝鲜佛教日本化	91
4. 越南佛教	92

六、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复兴	93
1. 印度佛教考古的开端	93
2. 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	94
3. 缅甸佛教的活动	95
4. 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佛教的活动	96
七、佛教在欧美的影响	99
1. 佛教在欧洲的流传和影响	99
2. 佛教在美国的影响	109
3. 国际佛教组织与主要活动	112
八、欧洲、美洲及大洋洲的伊斯兰教	113
九、中国的伊斯兰教	116
十、东南亚国家的伊斯兰教	124
十一、印度的伊斯兰教	129
十二、西亚的伊斯兰教	136
十三、埃及及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的伊斯兰教	145
十四、东南部及西部非洲的伊斯兰教	151

一、概 述

19 世纪 50—60 年代,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这个时期,欧洲、北美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残酷压榨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大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俄国和日本在经历了农奴制改革和“明治维新”以后,也踏上了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道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世界贸易成倍增加,资本输出扩大,殖民侵略加强。到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列强展开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一时期,作为欧洲广为流行的基督教,从总体上来看,经历了自身发展的阶段,逐渐适应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经济竞争、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的形势,并随着殖民主义的武力扩张,传入了亚非拉广大地区,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性宗教。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使南亚、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朝鲜等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殖民主义者在统治奴役这些国家的同时,输入了带有明显殖民色彩的西方基督教文化,试图在精神上彻底征服那里的人民。这样,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佛教、伊斯兰教受到压抑和排斥,从而激起

那里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在宗教旗帜下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

从基督教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罗马教廷一方面因教皇国的丧失和教廷与意大利、德国以及法国激烈尖锐的政教冲突，经历了自近代以来最危机、最艰难的历史阶段。意大利统一后，教皇国丧失了绝大部分的领土和臣民，使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降至自八世纪教皇国形成以来的最低点。而罗马教廷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之间进行的“国际文化”斗争，又遇到这三国政府激烈的对抗，致使罗马天主教会在三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应当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罗马教廷及其罗马天主教会的高级教士与德、意、法三国之间的紧张的政教冲突，是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教廷与世俗政府激烈斗争与不和的继续；同时也反映了罗马天主教会传统的社会政治观对正在形成中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不适应。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又由于出现了象利奥十三世这样的教皇，在政教之争中采取灵活的外交立场和作法，并通过向天主教徒施加道德影响，通过复兴托马斯主义神学，遏制天主教的神学自由主义思潮，通过鼓励劳资合作，提倡所谓“公教民主”和公教行动等做法，提高了罗马教廷的影响。罗马教廷对神学现代主义的压制和屡次颁布“禁书目录”的行动，再次显示出它在思想和态度上对于当代文化和民主与自由的不适与反动，结果最终造成了它落后于现代社会的状况。此外，由于移民运动，英国和美国的罗马天主教会在这一时期人数大量增加，并适应新的环境在新的土壤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这一时期，基督教新教在西方的发展相对而言比较顺利。德国的神学研究再次走在西方国家新教神学研究领域前沿，涌现出象利舍尔、哈那克和特劳赤那样著名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神学

家。利舍尔学派注重从历史上的具体事实去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基督教的历史,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神学研究者受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体现了 19 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对于现代化和人类发展的乐观主义态度和精神。而以特劳赤为代表的宗教史学派把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置于古代东方宗教和民族发展的背景中进行研究的作法,则显示出欧洲学者对于东方宗教、比较宗教学和人类学的兴趣。同时德国的圣经研究方法和成果也传至英国和美国,对那里的圣经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科学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和评判圣经,一方面显示出 19 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开放与求实的态度以及人类对于自我力量的信心,但另一方面它也动摇了圣经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间的权威地位,引起了信仰上的混乱现象和神学研究向多元方向发展的迹象,并由此激发了美国基要主义和基要派的产生。新教中出现的神学自由主义和基要主义,同罗马天主教会中的神学现代主义和对它的压制一样,都是基督教徒在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和认识的反映。这一时期,英国自由教会的人数和政治力量日益增加,为争取享有与国教会安立甘宗的平等权利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带来了英国教育的世俗化。然而到本世纪初自由教会却不如英国国教会那样关心社会问题和关心工人阶级的状况。美国教会的社会改良活动受英国教会的影响很大,英美两国的教会在这时期为改善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化和都市化环境中穷人的生活状况和境遇,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救济传教、社会服务和教育活动,对于稳定和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弥补社会制度的不足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在世界其它地方尤其是亚非拉国

家的传教活动进一步扩展,并在那些地方建立了使基督教传播下去的基础。正是由于基督教在 19 世纪的传播活动,基督教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的宗教。这些传教士在亚非拉的活动大都得益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力保护,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由于西方传教士对其他民族及其文化怀有歧视态度,所以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本地教会的神职人员,更不可能让他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本民族的基督教会。因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建立在亚非拉的基督教会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西方基督教会的翻版。

与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相比,东正教则依然处于历史发展的低潮,虽然俄国的东正教会呈现出复兴的迹象。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地区古老的东正教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由于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各个教会在西亚的传教活动,信徒人数有所减少。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东正教会则在 19 世纪后期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成为自治的东正教会。同期,俄国东正教会中修道院生活的复兴及其对普通信徒以及著述家和小说家的影响是俄国东正教会较为突出的特点。应当指出,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东正教会的礼仪对于东正教的延续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佛教而言,世界进入近代以后,无论是北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都处于衰落、沉寂状态。但佛教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毕竟是他们从祖辈以来的传统信仰,在它身上蕴含着民族世代相传的古朴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相当数量的道德规范,它的一些礼仪和节日已融入人民日常生活和习俗之中。一些国家佛教界的有志之士曾为“复兴佛教”作出重大努力,一直有一大批宗教僧侣和知识分子致力于批判西方文化,宣扬传统宗教与

文化,反抗外来的殖民宗教文化的侵略,抵御其挑战。19世纪末,佛教复兴运动在中国等国展开,佛教僧侣和学者刻经、印刷佛教典籍,创办佛教刊物,撰写有关佛教书籍,召开会议,成立佛教组织,致力兴教。北传大乘佛教是在困难中求得发展,不同的国家在复兴佛教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是以居士佛教复兴为主流,并进行了佛教革新运动;在亚洲国家中唯一摆脱了殖民地危机的日本,佛教向世俗化方面发展;朝鲜佛教具有日本化的倾向。

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南传上座部佛教由衰落开始复兴。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东方觉醒。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僧人倡导民族觉悟和人民团结,建立了佛教组织,积极地投入反对英、法等国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这些国家信奉佛教的有志之士曾为“复兴佛教”作出重大努力,他们撰写书籍,召开会议,宣扬传统宗教与文化,反抗外来的殖民宗教文化的侵略,抵御其挑战,致力兴教。

在印度,一些佛教胜(圣)地恢复旧观,一些重要的佛教遗址得到发掘和整理。印度本土学者积极研究印度古老传统的佛教文化,使在印度已消失达700多年之久的佛教又重新出现。在斯里兰卡,被称为佛教复兴之父的达磨波罗创立了“摩诃菩提会”,广泛与外界接触,致力于佛教复兴运动。在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一些佛教组织积极投入反侵略的政治斗争,佛教成为当地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的一支重要力量。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东方文化的了解,相继出现了一些佛教组织和僧团,并出版了不少佛教方面的著作和刊物,向西方人介绍和宣传佛陀思想。

这一时期,作为一支特殊社会力量的伊斯兰教,在亚非一些

主要国家里非常活跃。在那里,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纷纷建立起伊斯兰教组织,担当起当地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任。但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组织领导的这种斗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领导人,他们是一批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伊斯兰教知识分子和上层僧侣。他们主要热衷于伊斯兰教的内部革新,致力于伊斯兰教现代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力图通过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性来达到社会政治的革新。其中以埃及穆罕默德·阿布杜倡导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思潮和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影响最大。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苏丹等国相继建立起不少伊斯兰教的组织,领导当地穆斯林群众开展社会革新运动。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组织或教派直接领导和参加了当地人民的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朗的巴布教派运动。这一时期,中国穆斯林受到世界伊斯兰现代主义影响,开始兴起新文化运动。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教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伊斯兰教刊物和群众性伊斯兰教团体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引起了云南和陕、甘、青、新等地的穆斯林群众的反清起义。其中以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最为著名。这些起义,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罗马天主教

1. 罗马天主教的“国际文化斗争”

1869—1870 年教皇庇护九世在罗马召开了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制订了“教皇永无谬说”，即当教皇论及教义和道德问题时，教皇是无错谬的信条。1864 年 12 月庇护九世在《邪说提要》中声称教会有权统治世俗政府，而且他还通过第一届梵蒂冈会议的谕令强调了这一立场和主张。于是，他的要求便与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正在壮大的、绝对的世俗统治权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由此导致了罗马天主教会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所谓“国际文化斗争”(the Kulturkampf)。

(1) 意大利与教廷的政教之争

①意大利的统一与教皇国。早在意大利统一以前，历届教皇就都坚决反对意大利的统一，他们唯恐教皇国的自由受到一个强大邻国的限制。从 1870 年意大利统一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十年，意大利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教皇国”的问题上，即习惯上所说的“罗马问题”。

意大利统一后，政府即向欧洲主要国家表示，意大利将尊重

教皇的独立地位，还曾经尝试和罗马教廷进行谈判，但遭到梵蒂冈的拒绝。教皇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领土主权，而且罗马教廷的观点也得到了罗马天主教主要强国的支持。他们均拒绝把“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作为谈判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议会不得已于1871年单方面通过“保障法”。庇护九世立即对“保障法”进行谴责，同时作为一种抗议姿态，他自称“梵蒂冈的囚徒”把自己关闭起来。从此，他和他的后继者从“受迫害”的这一有利地位对“掠夺教会”的意大利政府不断进行抨击。

意大利议会通过的“保障法”主要是根据意大利君主立宪派领袖加富尔的思想制定的。他希望实现的是自由派天主教徒的“自由的国家里的自由教会”的理想。为补偿梵蒂冈的领土损失，“保障法”提出对梵蒂冈实行巨额经济补偿。但是这些补偿被梵蒂冈指责为“犹太的钱”而遭到拒绝。“保障法”规定，教皇可以永久地、不受伤害地免税使用梵蒂冈和其它一些房地产，在这些房地产内，教皇享有治外法权。“保障法”还规定，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将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当然，这些规定再次遭到教皇的断然拒绝，因为按照“保障法”，教皇只是有权使用有关财产而不是完全拥有这些财产。而且从法律上说，意大利政府可以单方面废除和改革上述立法规定。

②反对意大利的“十字军”和教廷的“不参政”政策。由于罗马教廷强硬不妥协的态度和行动的影响，意大利反教权主义者的力量反面得到了加强。庇护九世便向外国的罗马天主教徒请求援助。于是奥地利、德国和法国的罗马天主教团体开始以好战的态度大谈对意大利进行“十字军征战”。在财政上，人们对教皇的同情也使“彼得的便士”骤增，教廷的收入很快超过了以往教

皇国的税收进项。为鼓舞士气迎接征战,信徒们得到了“梵蒂冈囚徒”的“地牢之床”上的稻草和为新的“十字军”预备的红色法兰绒制服。教皇自梵蒂冈向意大利天主教徒发出禁令,不许信徒以投票或任职方式参与“意大利王国”的政治生活,他希望通过这种“静坐示威”的方式强迫意大利政府接受他的条件。罗马教廷的这种“不参政”(non expedit)政策迫使意大利天主教徒不得不在服从教权和爱国主义之间做出抉择,结果后者最终占了上风。庇护九世的后继者利奥十三世把这种“不参政”政策一直坚持到20世纪。

1876年意大利左派上台后立即参与了从政治上反对罗马公教主义的“文化斗争”。他们提出“滥用神职议案”,试图审判和处罚那些利用精神压力攻击政府的神职人员。1877年又通过高皮诺教育法令,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的控制,结果带来了意大利教育的世俗化。在大学里,天主教的神学系被迫关闭,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变成了两个互不干涉的领域。

③利奥十三世与意大利的对立。1878年2月20日新教皇利奥十三世上台。他在担任教皇的25年里,竭尽全力企图恢复教皇国,他曾向俾士麦、法兰西斯·约瑟夫,甚至法国的第三共和国寻求帮助一起反对意大利。利奥十三世曾60次正式抗议意大利对教会的掠夺,直到20世纪他还坚持要求意大利天主教信徒执行“不参政”的政策。

与利奥十三世反对意大利的行动相对应,1889年罗马树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迫害致死的乔尔达诺·布鲁诺的纪念塑像。同年意大利还颁布了限制神职人员活动的新的法律条款。10年以后,意大利政府还成功地阻止了利奥十三世出席“海牙和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

还投票反对教皇参加“凡尔赛会议”。

尽管利奥十三世利用其他国家企图恢复教皇国的努力完全失败了，但是他的确为罗马教廷赢得了新的道德影响力。1903年利奥十三世去世时，意大利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罗马问题”已不再是人们热情关注的问题。

(2) 德国的文化斗争

①德意志帝国与梵蒂冈的尖锐冲突。同意大利的文化斗争相比，发生在德国的文化斗争持续的时间较短。不过在德国导致冲突的政治原因也是相同的，即罗马天主教的利益对1871年刚刚实现但尚未稳定的德意志帝国的统一造成威胁。

德意志帝国的主要邻国奥地利、法国和波兰均为罗马天主教国家，罗马天主教会对于居住在波兰、阿尔萨斯—格林和德国南部的日耳曼人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时担任帝国宰相的俾士麦十分担心梵蒂冈的外交政策会对国内外的天主教徒施加离心作用，从而导致新的德意志帝国的解体。然而国会中的天主教中央党的教权主义势力则把他推向与罗马天主教会公开对立的境地。因为该党呼吁为了教皇的利益德国应当对意大利进行干预，显示出罗马天主教徒将宗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倾向。

这一时期发生的“老公会”分裂事件，也使德国的政教关系复杂化。在受老公会影响的学校里，教员拒绝接受梵蒂冈的法令，结果被天主教会的主教停止了工作或者干脆遭到解雇。但是政府却保护这些教员的利益，坚持只有政府有权任命和解雇教员。教育界争论的另一焦点问题，是在波兰日耳曼人聚居区的学校里授课用德语还是用波兰语的问题。大主教莱多霍夫斯基违背政府关于必须用德语讲授宗教课的规定，建立了波兰语私立

学校，结果被逮捕。

为了镇压罗马天主教的抵抗，普鲁士政府采取了特别的立法措施。1871年12月政府通过了《教士法》，规定对宣讲反对宪法的教士要予以判刑。后来梵蒂冈拒绝接受霍享洛赫为普鲁士德国驻梵蒂冈大使。普鲁士政府又于1872年7月通过一项法令，将耶稣会和其他有关的修会从德国驱逐出境。然而，双方的斗争不仅没有削弱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反而加剧了罗马天主教徒对政府的敌意。

1873年德国政府通过了《五月法令》，强行规定只有中学毕业后在大学里进修三年神学课程的人，才有资格充任教士，而且政府派出的督导员要控制教会的神学院。愿意进入神学院的学生必须首先通过政府规定的文化考试，所有教会职务的职责及其变化要事先征得行政长官的批准。教会只负责规定和教授宗教课程等等。德国罗马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对《五月法令》普遍表示不满，而囚禁或放逐这些不满的教士又引出新的问题。有的教区出现空缺，需要安排神甫或平信徒进行管理。由于政府对那些不服从的神职人员主持的婚礼的法律效应的怀疑，政府有关部门开始实施世俗婚礼，结果又与许多路德宗教会的信徒的意愿发生冲突。政府还取消了教士免服军役的规定，撤消了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馆。俾士麦还试图争取意大利和法国的支持反对梵蒂冈。结果罗马天主教徒对俾士麦极为仇视。

1875年2月5日教皇庇护九世颁布通谕宣布德国的《五月法令》无效。德国政府认为，这是梵蒂冈对普鲁士主权的公开否定，因而禁止这一通谕在德国出版。德国政府还规定，除专门从事护士工作的修会以外，其他天主教修会不得在德国活动。

②冲突的缓和。经过1871—1878年的斗争，德国的罗马天

主教会损失惨重，九个天主教主教区出现了主教空缺，约 50 万天主教徒无教牧人员；2000 名神甫被处以罚金，教会的收入也被截断；世俗婚礼已经成为义务；教会的学校、大学和修会被解散；一般民众对宗教普遍持冷淡态度。同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在欧洲盛行，得到工人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拥护。这两个现象都引起了罗马天主教会和俾士麦的关注。利奥十三世继任教皇后，双方的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878 年俾士麦对梵蒂冈发出了外交试探。1884 年 4 月 20 日利奥十三世颁布《人类》通谕，提醒人们，罗马天主教会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一通谕通常被许多人解释为梵蒂冈对德国政府表示的一种外交姿态。19 世纪 80 年代俾士麦通过行政手段逐步废除了有关的反教士法令。这次斗争使德国的天主教团体成为世界上组织精良注重政治效果的天主教会之一。

③“老公会”问题。“老公会”是罗马天主教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之后脱离罗马天主教会逐步形成的教派，最初主要是由拒绝接受梵蒂冈公会议法令的德国和瑞士的天主教徒组成的。实际上，早在梵蒂冈公会议之前和公会议期间，德国和奥地利的主教团就竭力阻止公会议对“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进行说明。但是面对意大利和梵蒂冈之间就“既成事实”的斗争，所有的德国主教最终在会上选择不反对将教皇永无谬误说定为信条。但是，以 19 世纪最有才华的罗马天主教史学家多林格为首的一些教授，对于主教们明知故犯的错误予以尖锐的批评，结果被当局革除教籍。于是他们自制纲领，拥戴赖肯斯为主教。1873 年在康斯坦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老公会正式组成。它很快得到普鲁士、巴伐利亚、奥地利、巴登和黑森政府的正式承认，并分得一部分教堂和财产。瑞士政府也承认了老公会，日内瓦的所有罗马天主

教会都转向了老公会，其它地方的许多教会也是如此。亲梵蒂冈的神职人员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梵蒂冈对此极端不满，1873年教皇庇护九世对瑞士政府进行了攻击，于是瑞士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

尽管老公会的信徒中有一批杰出的人才，但是该会对信徒大众缺乏吸引力，而且神职人员短缺，比如说，巴伐利亚的15个教堂才有一位神甫。老公会力量最强是在1878年，但也仅有5万人左右，此后人数开始减少。

(3) 法国与罗马天主教的政教之争

①第三共和国与罗马天主教的斗争。法国第三共和国诞生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罗马天主教会的问题，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将法国塑造成为一个共和国还是建成一个罗马天主教的法国。教士和平信徒中的主要领袖人物自然把罗马天主教的公教主义看作保皇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干预法国政治。

1879年以前，法国政府一直控制在天主教保皇党手里。70年代初，法国议会提高了教会的预算，鼓励增加在会教士的人数，给予教会控制慈善机构的权利，把国家教育的管理权还给了教士，并且还给予教会建立大学的权力。然而，尽管教会获得了这些权利，但是它们并未提高法国民众中的宗教活力。人们往往不参加公开的礼拜活动，很少有人愿意成为教士。在这几年间，法国开始逐步转向反对保皇党，因为该党不仅响应教皇干涉意大利的请求，而且还试图使法国卷入另一场与德国无望的战争中。由于保皇党政府脱离选民，后来资产阶级活动家甘必大才可能以“教权主义，敌人来了”为口号为共和派赢得选举。